

# 全球化與 “中國性”

當代文化的後殖民解讀

宋耕 編著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6

ISBN 978-962-209-818-3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http://www.hkupress.org>

康和印刷制作有限公司承印

# 目 錄

劉康教授序	vii
1. 導論：全球化與“中國性”——文化研究在中國的兩難處境 宋 耕	1
2. 休閒文化與文化資本 王 瑾（著）、包亞明（譯）	19
3. 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電影的文化批判 王 寧	51
4.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陸媒介與大眾文化 范 紅	67
5. 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 周小儀、童慶生	85
6. 全球化和中國文化討論中的民族主義分歧 徐 賁	101
7. 全球化或本土化？中國“女性主義”面臨的挑戰 吳燕娜	129
8. 中國文化中“陽剛”建構的後殖民解讀 宋 耕	153
9. 後現代文化語境中的歐洲中心主義、現代性與中國文化 焦慮：從 007 系列電影中的華人形象說起 毛思慧	177

10. 漂泊流離的同志漫遊者：論王家衛《春光乍洩》  
中的九七／回歸陰影  
林松輝 203
  11. 自我出演·個性經濟：解讀全球化語境下的“超級女聲”  
和“芙蓉姐姐”現象  
肖 慧 213
  12. 城市觀光：香港旅遊業的視覺論述  
彭麗君 233
  13.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記憶、思考和爭論：  
解讀“浩劫”話語  
高默波 247
  14. 創傷記憶與藝術批判的可能性：重讀九十年代的  
“毛熱”現象  
葉雲山 261
  15. 從“九一一”事件看中國融入全球體系的二元思潮  
沈旭暉 279
- 後記  
宋 耕 291
- 作者簡介 293

# 1

## 導論： 全球化與“中國性”—— 文化研究在中國的兩難處境

宋 耕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頭，也是愚昧的年頭；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

—— 狄更斯《雙城記》

這是全球化的時代，也是本土化的時代。

—— 編者

---

“文化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是近二三十年來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所面臨的最大轉變和挑戰。雖然從廣義上講，一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都是關於“文化”的研究，然而狹義的“文化研究”卻意味著思維方法和研究範式上的全新突破。學術領域的文化研究在方法論上主要受西方批評理論的影響，其中最核心的特徵是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警覺和批判性思考。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

義和後殖民主義是文化研究的三大理論源流。它們關注的側重點雖然各有不同（分別集中在階級、性別和國家／民族三個問題上），但在本質上又是相通的，那就是對邊緣話語和邊緣團體的關注、對霸權的顛覆和對權力本質的批判。因此，“文化研究”雖然很難用簡單的語言給出定義，但它的特徵卻很容易辨認：它關注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打破傳統的精英／大眾文化的界限，提供對文本的政治性解讀以及對歷史的文本性認識，側重對文化身份的批判性思考等等。<sup>1</sup>同時，文化研究在本質上還是一種跨學科和跨文化的研究，它打通了傳統的學科界限。正如宋文里所說：“文化研究的特色就在於此——它是人文／社會研究這個總體的反學科，它坐落在靜態的客觀知識對面，在欲望和恐懼的拉扯之間，最後它出現為對於權力的理解，和破解。”<sup>2</sup>文化研究的興起可以看作是在全球化、商品化時代日益邊緣化的人文學科重新整合，努力“自救”的一種策略。因為它使學術研究走出書齋，前所未有地與普通人關注的熱點問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用霍爾(Stuart Hall)的話說，文化研究的使命是“使人們理解正在發生什麼，提供思維方法、生存策略與反抗資源。”<sup>3</sup>但吊詭的是，它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方興未艾的文化研究正在日益成為傳統學科的掘墓人。當一切都歸於“文化”時，傳統學科的生存本身也就面臨了危機。例如，在今天各類文學領域的學術研討會上，討論最多的話題就是——“文學”的死亡。

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現代邏輯以及全球化理論〉一文中指出，“對於文化研究而言，語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語境”，因此文化研究可以被視為“一種語境化的關於語境的理論”。<sup>4</sup>中文語境中的文化研究呈現出和西方不同的面貌。對文化研究理論著作的譯介和用中文寫作的文化研究論文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末，進入90年代以後文化研究的方法日益對傳統學術構成巨大的衝擊。文化研究在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既造成了相似的衝擊波，又因三地政治語境的不同，關注的側重點明顯有所不同。由於英文在學術界的主流地位，香港可能是兩岸三地最早接受文化研究影響的地方，並且其研究也最接近西

方學術的特色。香港的文化研究在97回歸前後達到高潮，其關注點主要是電影、城市文化、大眾／普及文化以及後殖民與本土文化／意識等。<sup>5</sup>而台灣除了日益高漲的對後殖民、身份和文化認同問題的興趣外，其“酷兒”研究、性別研究、網路文化的研究近十幾年來似乎特別火熱。他們也翻譯了不少理論專著，充實了中文語境的批判資源。<sup>6</sup>在中國大陸方面，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被介紹進來主要是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的事，90年代中後期，“文化研究”開始成為大陸最時興的辭彙之一。由於大陸特殊的政治環境，文化研究的核心問題主要是圍繞著“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問題。例如近期有不少文章討論西方後殖民理論和中國（新）民族主義思潮之間的關係。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等書成為全球化時代中國語境中文化研究的最受關注的著作。同時，在某種意義上說，大陸的文化研究也是最偏離西方語境中的研究特色的。陶東風曾指出：“中國的文化批評普遍地具有情緒化、隨意化、隨筆化的傾向，學術水準總體而言不高。”<sup>7</sup>實際上，文化研究在兩岸三地的不同風貌正是生動地反映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不同的歷史經驗、現實環境，與國際“接軌”的程度、政治權力對學術的干預程度的不同等等因素，決定了上述差別。

本書所收錄的14篇論文，基本上都是未經正式發表過的。這短短的14篇文章，涉及的領域卻包含了國際政治、國際關係、歷史、文學、電影、性別研究、旅遊業、媒體與大眾文化、廣告與視覺藝術、網路文化以及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等，集中體現了文化研究的跨學科特色。其中不少議題是當前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門”話題。同時，作為一本學術著作，本書力圖反映當前中文語境中文化研究的理論特點。在這本薄薄的集子裏，上述兩岸三地文化研究的不同特色也多少有所體現。將這些文章對照起來閱讀，可以使我們更加全面、清醒地分析和探討全球化背景下中文語境中文化研究的現狀和出路。這也正是編輯本書的目的之一。此外，由於一些論文是從作者自己的英文著作改寫／翻譯而來，

實際上這本書也是溝通中文和英文學術背景的一個嘗試。而所有的論文都圍繞著全球化和“中國性”這樣一個中心論題，其理論背景便是文化研究在當代中國的兩難處境。

## 二

如前所述，文化研究從本質上講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精神的延續和發展，是產生於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土壤的一種政治性的批評方法和反抗策略。由於中國大陸迥然不同的政治環境，勢必導致被“移接”到中國當代社會中的文化研究產生某種“變異”，甚至是面臨一種尷尬的兩難處境。事實上，近期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學者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並展開了討論。<sup>8</sup> 例如，陶東風曾經這樣評論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批評：

中國的文化批評在學術上雖然沒有學到西方文化研究的功夫，但是在價值取向與政治傾向上卻又常常亦步亦趨地照搬西方，這就是一味地向左轉，批判資本主義。殊不知西方國家推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文化研究作為一種邊緣的批判話語，向左轉是應有之義。然而我們至少不能簡單說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即使批判資本主義也應當與西方有所區別。換言之，既然文化批評具有特別強烈的政治色彩，那麼，對它來說，準確地勘定當代中國的權力關係（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就顯得殊為重要。<sup>9</sup>

文化研究，特別是後殖民理論，在中國的兩難處境表現在：一方面，它借鑒和使用西方最“新潮”的批評話語，呈現出反權力、反壓迫的外貌；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特殊的權力關係，它又在某種層面上得到官方認可甚至在本質上扮演權力同謀的角色。因此，徐賁指出，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論與方法在進入中國後，由於對不同的語境缺乏應有的反思與警醒，致使西方理論在中國本土產生了極大的錯位與變形，甚至違背了西方文化研究的精髓與靈魂。<sup>10</sup> 而在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後殖民批評與第三世界批評同中國（新）民族主義之間的同謀關係。



有關“現代性”與“中國性”問題的討論是大陸文化研究的核心熱點問題。“中國性”(Chineseness)的問題最初是由海外學者提出的，強調其話語性與建構性。<sup>11</sup>而中國知識份子<sup>12</sup>在90年代所提出的“中國性／中華性”，乃是作為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一種替代和挑戰，對西方霸權的一種對抗，這在某種意義上繼承了官方話語關於“民族性”的論述，又明顯具有文化相對主義的色彩，在90年代以後的中國充當了（新）民族主義的理論資源。<sup>12</sup>王一川在〈中國文化現代性：從現代1到現代2〉一文中認為，中國文化現代性是包含若干長時段的超長時段過程。從晚清至20世紀70年代構成中國文化現代性的第一個長時段即現代1；從1980年代至今則是中國文化現代性的第二個長時段即現代2。現代1的中心使命是按西方話語標準而尋求中國文化的全球化。現代2的中心使命已不再是按西方話語標準去尋求中國文化的全球化，而是在全球化世界種種陌生的他者話語中興立中華文化話語及其獨特個性。這不是要全盤否定和拋棄文化現代1的“西化”遺產而回歸古典，而是在同時承認現代1的歷史性得失的前提下，立足於當今世界語境而在世興我，即在全球化世界努力興立中華文化的自我形象及其獨特個性。<sup>13</sup>這種認為中國向西方學習、追求普世主義“現代性”的階段已經告一段落，中國在21世紀的目標將是通過重構和弘揚“中國性”來重新尋回自我，進而為世界的發展提供另類“現代性”的觀點，實際上延續了早些時候提出的“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樂觀論斷，反映了在中國大陸經濟起飛、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的時代背景下的膨脹的民族自豪感和對“中國／世界”關係的重新定位。這種文化上的“反霸權”主義和相對主義，同政治、經濟上的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相呼應，在某種程度上成為1992年以後中國官方話語的思想“同謀”。<sup>14</sup>本來，全球化與本土意識之間的關係，是21世紀各個文化，特別是第三世界文化，面臨的共同課題和思考焦點，但是在中國，由於民族主義的強勢地位和官方背景，就使得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化，也使文化研究的處境更加尷尬。

在思想學術領域，“新左派”的崛起是90年代的重要特徵。<sup>15</sup> 和教條主義的“老左派”不同的是，“新左派”反映了知識份子對今天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權力關係以及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反抗”。他們以“自由左派”的面目出現，強調其邊緣性和批判性，然而實際的政治功能卻是在一個還沒有脫離“左”的集權統治的社會裏，呼籲再向“左”轉，包括從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時代背景重新看待毛澤東和文化革命，為其“翻案”。而他們在理論資源上也大量引用“西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相對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理論。這些在西方被視為“激進”的理論，在中國卻為“保守派”所用。事實上，“左”與“右”、“激進”與“保守”乃是相對的概念，完全取決於不同的歷史語境。在今天的中國，這些好像正好和西方掉了個個兒。這也正是文化研究所面臨的兩難困境。而在民族主義的崛起、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上，1992年後的中國社會也呈現了許多獨特的“特殊性”。

1989年以後中國社會主流思潮的演變，是當初許多學者始料不及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事件、中美南海撞機事件、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釣魚島爭端等，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中國民間反美反日的浪潮。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將其稱為中國的“新民族主義”。他認為民間的反西方情緒是官方認可和鼓勵的，例如關於鴉片戰爭以來民族恥辱和“洗雪國恥”的教育、關於美國霸權主義的妖魔化描述以及關於中國經濟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過分樂觀和具有煽情性的宣傳等，都直接導致民族主義思想的膨脹，但同時這種已經被中國年輕一代內化了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一旦演化為民間的力量，又很可能會失去控制，進而破壞共產黨對政治話語的官方壟斷，甚至威脅到其政權的穩定性。<sup>16</sup>

網路空間的飛速發展打破了官方對話語的壟斷。網站成為宣洩民族主義情緒的主要管道。在今天中國大陸的各類“論壇”上充斥著抵制日貨、收復台灣等言論。然而，和“五四”時代或抗日戰爭時期的民族主義不同的是，由於網路空間的虛擬性和匿名性，今天的“民族主義”實際上表現為一種後現代的喧嘩，一種政治正確的、安全的嘉年華。網路上的一篇文章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

更不可思議的是大學生那些無限膨脹的、變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尤其是反美、仇日、大漢族、大統一的狂熱情緒。他們狂熱地閱讀《中國可以說“不”》這類極端主義宣傳品。對於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中美飛機相撞事件，他們義憤填膺，上街遊行、焚燒美國國旗；對於“九一一”事件，他們則與全世界罪惡的恐怖份子一起彈冠相慶。但若有機會得到赴美簽證，他們則會興高采烈、毫不猶豫。他們熱血沸騰地支持動用武力“解放”台灣，但若要他們穿上軍裝衝鋒陷陣卻又絕對不可能。<sup>17</sup>

在今年（2005年）4月北京、上海等地爆發的大規模反日示威中，電視鏡頭上出現了“中國人民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的大幅標語。看過今年初由馮小剛執導的、充滿商業廣告的賀歲片《天下無賊》的人，都會忍俊不禁。因為這句“經典”名言，出自劇中葛優飾演的賊頭之口：“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黎叔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對這樣一句“經典”對白的“戲仿”，出現在示威隊伍裏，使義憤填膺的“愛國主義”平添了一份後現代的嘉年華色彩。正如許紀霖所說，“這種自上而下蔓延開來的反西方主義，”是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sup>18</sup>

關於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悖論關係，汪暉曾經指出，“當代的民族主義政治與傳統民族主義存在重要的差別，與其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對立物，毋寧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副產品。”<sup>19</sup>在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膨脹和中國日益融入全球化資本主義似乎並行不悖。我們不妨以北京舉辦2008年奧運會這樣一個民族主義符號來看這一問題。北京“申奧”的成功實際上是以中國在人權等問題上向西方妥協作為代價的。而且北京奧運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中國“全球化”的速度和決心。用中國自己的話說，就是最關鍵的是“與國際接軌”的問題。官方發起的全民學英語的運動等，目的都在於縮小中國和“世界”的距離，使中國更加融入“世界”。然而，另一方面，奧運會又成為官方宣傳“民族自豪感”的絕好素材，被賦予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意義。奧運會不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象徵，甚至還有點兒重溫昔日中華帝國“萬邦來朝”的美夢的意味。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宣傳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one world, one dream)在意識形態上反映了當代中國融入世界、融入全球化的強烈願望，21世紀的中國渴望從“被開除球籍”的邊緣地位進入中心，平等地參與全球“新秩序”的建構。劉康認為，當代中國從領導人到普通民眾，可能是對全球化最熱衷的民族。<sup>20</sup>同時，正如沈旭暉在本書中指出的，當代中國官方和民間在對待“世界”的態度上，存在著相互矛盾的二元思潮，即一方面企圖擺脫邊緣地位，融入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對世界的不信任，對西方的警惕和懷疑。近年來頻頻傳出的，中國遊客在國外因為一些小事，而上升到“民族尊嚴”問題，與人大動干戈的報導，背後反映的實際上是長期閉關鎖國之後“暴發戶”的自卑心理。

劉康認為，1990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化，不能簡單地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現代或後現代來加以界定，而應該看作是一個體現全球化的根本矛盾和衝突的後革命的“雜交”(hybrid)文化。<sup>21</sup>按照他的觀點，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體現了資本主義全球化自身的“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矛盾。這也就是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所稱的“glocalization”<sup>22</sup>在這一框架下，劉康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20年，是中國同全球化資本主義進行鬥爭和抗衡的20年，是在蘇聯東歐模式徹底失敗後尋求另類“現代性”的努力。

王瑾在本書〈休閒文化與文化資本〉一文中，也非常精闢地論述了“後1992”中國社會權力關係的複雜性。王瑾認為，“中國這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狀對西方理論架構中的國家社會關係論提出的挑戰，是無法訴諸權力(國家)與抵抗(公民社會)的二分範式來充分回答的。”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壓迫／被壓迫”、“專制／民主”這樣簡單化的、冷戰思維式的二元對立思想來分析今天的中國顯然是不恰當的。但和劉康不同的是，王瑾認為當代中國社會更多地呈現的是全球化和後社會主義時代，各種權力關係之間協商、妥協和共謀的局面。今天的中國政權和“人民”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一種壓迫與反抗或壓迫與

服從的關係，不如說是一種相互利用和妥協的關係。同樣地，文化與資本、中共意識形態與全球化資本也存在著這種“共謀”的關係。用這樣的批評模式來分析當前中國的文化 and 社會顯然更加準確。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任何權力關係都可以因為利益的變化而重新組合、重新結盟。例如關於“民族主義”的問題，徐賁認為，“民族主義”不但可以被官方權力所利用，也同樣可以與自由主義結盟，強調“當前中國民族主義的群眾基礎及其作為體制外現成的公民領域和民主政治空間的價值”，從而為當前中國的政治改革尋找一條“沒有出路的出路”。<sup>23</sup>

當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複雜性，決定了文化研究在中國面臨的兩難處境。而問題的關鍵就是要準確把握中國社會中權力和壓迫的本質。在筆者看來，對中國當代社會和政治的分析存在著兩個誤區。1989年，特別是1992年以後，中國社會在全球化背景下所經歷的巨大轉變固然是無法用簡單的、二分式的冷戰思維來解釋的。但同時，也要防止將這種轉變無限地誇大，還必須要看到社會制度的延續性。中國政治的本質有哪些是從1989年以來甚至是1949年以來並沒有變化的？換句話說，在我們（文化評論者）擺脫冷戰思維的同時，也應該思考今天中國的政治是否真的完全脫離了“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軌跡。不要忘了，至少在官方文件中，今天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sup>24</sup>因此，我所提到的這兩個誤區就是：不要因為官方政治話語中的字眼，而忽視了中國融入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社會實質；也不要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權力關係的暫時共謀而完全忘記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本質。需要仔細分析的是，中共在哪些方面與全球化資本主義妥協、共謀，在哪些方面仍然堅持其政權的壓迫性？同樣地，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講，文化相對主義也不可以絕對化。既要重視發現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要認識人類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存在著共通性。在對霸權主義和後殖民主義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同時，是否也應該關注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生存條件、他們對現代化的追求，以及爭取基本人權和尊嚴的鬥爭等。

在今日中國這樣一個政治、文化上仍然處在集權統治下，經濟上卻加速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的社會裏，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務是什麼？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繼續“五四”以來“現代性”的啟蒙，包括對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追求，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尋找“中國性”，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場上反抗霸權主義？抑或是像有些中國學者所提出的那樣，在兩條戰線上同時戰鬥，在不同的語境中反抗不同的壓迫？<sup>25</sup> 這些正是本書所要探討的焦點。

### 三

本書的中心議題是全球化對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的影響以及中國文化的應對／抵抗策略。書中的 14 個章節，分別側重在不同的方面，有的圍繞著全球化與“中國性”的中心議題直接展開立場各不相同，甚至是針鋒相對的論爭；有的雖然不是直接探討這一理論問題，但在具體文化現象的批評中可以看到不同批評範式的傾向。因此所有的文章實際上都反映了上面提到的文化研究在中國語境下所面臨的困境和抉擇。本書又可細分為若干個小單元，分別側重在不同的領域和主題，同一個單元裏幾篇文章往往是從不同甚至相反的視角和立場來看待同一個問題。同時，本書作者的文化背景、政治立場和理論訓練各不相同，因此這本書也可以作為一部當前中文語境中文化研究的對話集來閱讀。

如前所述，王瑾的〈休閒文化與文化資本〉從理論的高度提綱挈領地深刻剖析了“後 1992”中國社會所經歷的重大變革。她認為，休閒文化話語的興起，反映了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互相轉換、互相利用的關係，這正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徵。通過分析消費與文化、消費與自由時間、消費與生產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消費主義民主”正在成為新的、官方的意識形態。通過國家的文化政策，通過文化與資本的結盟，“後社會主義中國已經從強迫性的統治形式轉向了規範管理式的統治形



式”。貫穿這篇文章的一個中心觀點是，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與政治問題的複雜性，使一切二分式的思維方式都顯得過於簡單和過時。這也是編輯本書的一個主導指標。

在全球化與“中國性”的關係方面，有的學者以後殖民理論為武器，強調對文化霸權主義的抵抗，強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強調探索另類“現代性”。例如王寧的〈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電影的文化批判〉，總結了近20年來全球化對中國電影造成的衝擊和影響，提出了“逆向”地使用全球化概念的策略，即充分認識文化全球化的“積極因素”，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化和電影推向全世界，“以便在一個更為廣闊的國際語境下發展我們的民族文化……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和美學精神。”有趣的是，如果將王寧和王瑾的文章做一個對比，就不難發現中英文語境下文化研究的鮮明差別。作為一篇從英文翻譯過來的文章，〈休閒文化與文化資本〉集中體現了美國人文學術界的理論概括能力和批判性思維方式。而王寧的文章則具有中國學者鮮明的政治目的性，以及在全球化時代弘揚中華文化的熱忱。這種不同學術範式之間的對話，也貫穿在全書的其他各個章節之中。

和王寧的文章觀點類似的，還有范紅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陸媒介與大眾文化〉。范文認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大陸媒介的傳播形態和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由其塑造的大眾文化也體現出新的特點。面對西方經濟強國的文化強勢和文化霸權，中國大陸媒介在營造開放的全球文化交流氛圍的同時，應當如何維護文化的民族性、實現在全球弘揚中華文化的目標，已經成為迫在眉睫、急需解決的問題。”在新型傳播形態下，大眾文化以外來文化為主導，民族文化傳統受到衝擊，因此“弘揚中華文化”才是大陸媒介的生存之本。本書中毛思慧的文章則以007系列電影中的華人形象為切入點，探討後現代文化語境中的歐洲中心主義、現代性與中國文化焦慮問題。作者將電影閱讀作為一種跨文化的政治活動，分析007電影中的霸權式話語宰制和東方主義視覺構建，進而提出重讀現代性和“文化焦慮”的問題，並呼籲：“放下革命武器、天下文化相融的‘環球化’應該緩行！”

周小儀、童慶生的〈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認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與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現代性的認同有著密切關係，因此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文學的社會性與文學的獨立性這兩種基本觀點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探討時就不難看出，在本土各種形式的文藝論爭中呈現出來的不同文學觀念，實際上是對東西方的文化關係結構的不同認識和表述。例如關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的歷史意義，過去西方漢學家認為是政治操控文藝的綱領性檔。實際上，如果從更為廣闊的東西方的文化關係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就不難發現，〈講話〉所宣導的文藝工具論和文學階級性是關於現代性的第三種敘事。這種關於現代性的敘事不同於西方民主與科學的啟蒙主義現代性，也不同於西方反現代性的現代主義美學話語。這第三種現代性敘事立足於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邊緣位置，以工農兵為階級力量的基礎，為中國建構了新的歷史主體性。

本書中的另外一組學者則強調“全球化”對中國社會改造的進步意義，強調公民社會的建構和反抗內部“霸權”的必要。徐賁在〈全球化和中國文化討論中的民族主義分歧〉一文中認為，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直在“國際關係”的範圍內展開，多種民族主義思潮和話語雖然有時提及“全球化”，但並沒有真正進入全球化視野。這樣理解全球化，會嚴重忽視全球超國際關係中最具本質意義的三個特徵，那就是全球化所形成的超國家關係、超國家疆域新社會空間和全球性新公民政治主體。只有涉及了當今世界的社會性空間和政治行動主體的變化，全球化這一概念才會具有實質性的全球政治意義。而從全球化的這三個方面來理解全球化的意義，會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公民政治在當今中國的現狀和前景。作者在分析了作為“體制外民主”的大眾民族主義之後，提出了“積極民族主義”和“全球治理”的概念。吳燕娜的〈全球化或本土化？中國“女性主義”面臨的挑戰〉分析了中國大陸的婦女運動和西方女性主義的關係之後，重點指出了中國婦女工作“超前”和“滯後”的矛盾。作者認為，



中國婦女研究學者只抗拒西方女性主義可能存在的殖民主義式霸權話語還不夠。學者對國內政權的威權主義、民族國家主義和可能的霸權主義政策和話語也應該警惕抗拒。沒有基本人權也就沒有真正的女權。

關於全球化時代中國融入世界的腳步，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問題，沈旭暉的〈從“九一一”事件看中國融入全球體系的二元思潮〉可以作為重要參照。作者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問題。通過分析中國官方和民間、“自由派”與民族主義派對“九一一”事件的不同反應，將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態度分為“信任範式”與“不信任範式”這樣一組二元世界觀，並以此論述中國融入全球化的問題。

關於在全球化的新時期對中國歷史和文化進行重新解讀的問題，高默波和葉雲山的文章頗值得玩味。兩篇文章圍繞著重讀“文革”和“毛澤東熱”的問題，其觀點卻可互為參照。高默波從敘說的權力這樣一個角度解讀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正確”的“浩劫”話語，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其背後的權力關係。通過對“文革”話語的解構，作者試圖提出“誰為誰敘說？為什麼敘說？誰有敘說的權力？誰有敘說的文化和經濟資本？誰有敘說的市場？”這樣一系列有關歷史敘說的核心問題。如何對“文革”的歷史進行解讀，實際上反映的是對中國文化和政治的根本認識和思考，例如阿城就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從秦始皇就開始了。<sup>26</sup>而葉雲山的〈創傷記憶與藝術批判的可能性：重讀九十年代的“毛熱”現象〉則利用阿多諾(Adorno)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將90年代的“毛澤東熱”解讀為在政權與市場的共同操縱下，對創傷的集體“上演”(acting out)和消費狂歡，在本質上是“幻覺構造”，或者說“偽裝文化”。

本書的另外一組文章主要以全球化和後殖民理論為依託，對當代電影、大眾文化、視覺藝術和性別建構進行解讀，側重在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宋耕的〈中國文化中“陽剛”建構的後殖民解讀〉從性別研究和後殖民的角度解讀中國文化中的“陽剛”建構。對受西方文化影響（或殖民化）以前的中國古代社會中的

性別話語進行“重構”和再解讀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即今天中國社會中的主流性別話語，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以來西化和“現代化”的產物，它已經和“前現代”(pre-modern)的性別建構有了很大的差別。作者認為，在中國古代“男／女”並不是一對重要的性別身份分類，因而簡單地將“男／女”、“同性戀／異性戀”這樣的二元對立的模式套在中國古代文化的性別問題上是很不恰當的。中國社會中的二分式“男／女”性別建構是伴隨著對“現代性”的追求、對“傳統”的重新解釋而從西方舶來的。在對“文／武”、“陰／陽”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陽剛”理論概括之後，作者通過解讀電視連續劇《大染坊》分析了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中陽剛建構的特點，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影響、民族主義話語和全球化資本主義與性別話語之間的關係。

林松輝的〈漂泊流離的同志漫遊者〉對王家衛的《春光乍洩》進行了寓言式的政治解讀，重點剖析其中的“九七回歸陰影”。作者認為這部以三個男人的關係為主線的電影，在意識形態上仍脫離不了九七／回歸的話語。“從某種象徵意義上而言，影片所顯露的欲拒還迎的心態，正切合了香港九七回歸前的焦慮不安乃至歇斯底里的精神狀態。兩個來自香港的主角實際上是一個性格分裂的香港：黎耀輝代表的是渴望回歸、依戀父權的香港，而何寶榮代表的是醉生夢死、繼續與洋人廝混的香港。但影片的第三個主角小張卻來自台灣，也正是這個角色為《春光乍洩》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變數與張力，使得回歸此一課題變得更為複雜。”

彭麗君的〈城市觀光：香港旅遊業的視覺論述〉通過解讀香港旅遊業的宣傳策略，分析回歸後的香港所面臨的在“國家化”與“國際化”兩個共謀的論述中建立本土身份的困難。作者認為，從具有東方主義色彩的“魅力香港，萬象之都”到充滿後現代、後資本主義視覺假象的“動感之都”（兩者都是香港旅遊協會拍攝的推廣香港旅遊業的宣傳短片），其間的變化可以說反映了九七後香港對自身文化處境的掙扎。

肖慧的文章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解讀了目前大陸網路和電視的流行文化，即紅極一時的“超級女聲”和“芙蓉姐姐”現象。作者

將這兩個表面互不關聯的文化現象放在文化、政治與資本結盟的當代中國語境中加以研究，剖析全球化娛樂經濟對中國意識形態和民眾心理的影響，探討市場和國家意識形態在新一輪流行文化話語的構成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在主體型塑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例如作者發現芙蓉姐姐的過度(excessive)女性化的身體其實正是對後毛澤東時代主旋律的過度(excessive)詮釋。“芙蓉姐姐”在網上的風靡反映了一種“後毛澤東時期紅衛兵般的超級癡狂偏執所帶來的黑色幽默。”而“超級女聲”的走紅則反映了市場對“個性經濟”的炒作。剛剛看到報導，由於“超級女聲”所引發的關於民主政治的廣泛討論，湖南衛視在政治壓力下已經決定明年停辦這一節目。純娛樂節目要承載本不應屬於它的民主政治這類嚴肅的內容，這或許也是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特色”的又一體現吧。

#### 註釋：

1. 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現代邏輯以及全球化理論〉一文中總結了文化研究的六個特點：一、文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代表了面對相對主義的挑戰，尋求新形式的思想權威的努力，它並不向相對主義讓步；二、它是跨學科的，因為它認識到任何關於文化和權力的問題勢必超出傳統的學科界限；三、自我反省是文化研究的特點，不僅表現在個體身份方面，而且表現在體制和關係結構方面；四、文化研究的驅動力往往是政治的而不是純理論的關注；五、雖然文化研究不能單純從理論方面定義，但理論又是必不可少的；六、文化研究是極度語境化的，對於它的理論、政治、關注的問題、研究的物件等等而言，都是如此。參見 Lawrence Grossberg, “Cultural Studies: Mo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in Angela McRoddie, ed. *Back to Reality? 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
2. 宋文里：〈《文化研究在台灣》書評〉，《文化研究月報》第二期（2001年）[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book\\_3.htm](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book_3.htm)（2005年3月7日登陸）。
3. 參見格羅斯伯格(L. Grossberg)等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1992)〈導言〉。
4. Lawrence Grossberg, “Cultural Studies: Mo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p. 8.
5. 參見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 1970–200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等。

6. 參見陳光興主編：《文化研究在台灣》（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年）等。
7. 陶東風：《文化研究》<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508>（2005年3月5日登陸）；另參見金元浦：《文化研究：中國與西方》等著作。
8. 例如 Zhang Kuan, “The Predicament of Postcolonialism in China,” in Karl Heinz Pohl, ed. *Chinese Thought in a Global Context: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 (Leiden: Brill, 1999), pp. 58–72.
9. 陶東風：《文化研究》<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508>（2005年3月14日登陸）。
10. 徐賁：《文化批評向何處去——1989後的中國文化討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第195頁。
11. 參見Rey Chow,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boundary 2*, 25:3 (1998), pp. 1–24; Gregory B. Lee, *Chinas Unlimited: Making the Imaginaries of China and Chinese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等。
12. 張法、王一川、張頤武：〈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文藝爭鳴》1994年第2期。
13. 王一川：〈中國文化現代性：從現代1到現代2〉，2004年6月提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主辦的“國家疆界與文化圖像國際研討會”。
14. 參見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二十一世紀》第39期，1997年2月，第4–17頁；張靜：〈新保守主義學術取向〉，《二十一世紀》第39期，1997年2月，第18–27頁；陳曉明：〈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二十一世紀》第39期，1997年2月，第35–46頁；蕭功秦：〈當代中國新保守主義的思想淵源〉，《二十一世紀》第40期，1997年4月，第126–135頁；蕭功秦：〈新保守主義與中國現代化〉<http://www.confuchina.com/08%20xiandaihua/xin%20baoshou.htm>（2005年10月17日登陸）等。
15. 參見公羊主編：《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以及任劍濤：〈解讀“新左派”〉，《天涯》1999年第1期。
16. 參見 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7. [http://www.guxiang.com/forum/topic.asp?TOPIC\\_ID=150969&FORUM\\_ID=160&CAT\\_ID=31](http://www.guxiang.com/forum/topic.asp?TOPIC_ID=150969&FORUM_ID=160&CAT_ID=31)（2003年12月23日登陸）。
18. 許紀霖：〈中國的民族主義：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收入樂山主編：《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0–48頁。
19.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收入公羊主編：《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第40頁。
20. Liu Kang,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ends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 4.
21. 同上，第3–4頁。

22. 參見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1992);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1992), pp. 25–45; “Social Theory, Cultural Relativity and the Problem of Globality,” in Anthony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69–90.
23. 徐賁：〈全球化和中國文化討論中的民族主義分歧〉，見本書第6章。
24. 2006年2月20日的《新政治家》雜誌(*New Statesman*)刊登了Isabel Hilton的文章〈卡爾，中國需要你〉(Karl, China Needs You)，生動地分析了當前中國的社會狀況和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重振”馬克思主義的決心。據悉，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對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設，將由官方撥款，組織全國專家編寫課本、培訓理論人才以及建立理論研究機構，以期使中國成為全球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http://www.newstatesman.com/200602200018> (2006年3月25日登陸)。
25. 陶東風在〈後殖民主義與第三世界批評在中國〉一文中指出，“(後殖民批評的)批判性與激進性在進入與西方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之後，卻不一定能夠得以繼續保留。相反它有可能與主流文化以及現存體制處於一種曖昧不明、相互勾連的關係中。在許多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國家，反西方、尋求民族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已經是官方的一個基本政治策略(尤其是在吸收民族主義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以後)。這樣，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如何將自己的民族文化關懷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策略清醒地區分開來，就變得極其重要。這也就是說，第三世界國家的後殖民批評在批判國際間的文化霸權、文化壓迫的同時，不能迴避或無視國內官方與民間、政府與自由知識份子之間存在的文化壓迫與文化霸權。一般說來，第三世界國家的知識份子整體上受到性質迥異的兩種壓迫，作為中國的知識份子(國際間的民族身份)，他受到來自西方的文化殖民；而作為民間的知識份子(國內的政治文化身份)，他又受到來自專制政體與主流文化的壓迫。相應地，他的鬥爭策略就應當是在“兩條戰線”上的作戰。既要反對國際間的文化壓迫，又要反對國內的文化壓迫。前者是爭獨立(作為民族知識份子)，後者是爭自由(作為民間知識份子)。”<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498> (2005年3月21日登陸)。
26. 阿城：《閒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台北：時報文化，1997年)，第81頁。

# 作者簡介

## (英文姓氏序)

**包亞明** (Bao Yaming)，文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助理，《上海文化》雜誌社常務副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都市文化理論、中國城市文化研究。著有《遊蕩者的權力：消費社會與都市文化研究》(2004)、《後現代語境中的美學與文化理論》(2003)、《上海酒吧：空間、想像與消費》(合作，2001)、《在語言與現實之間》(1998)等。譯有《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林迪厄訪談錄》(1997)。

**范紅** (Fan Hong)，牛津大學語言與跨文化傳播博士，現任北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媒介與社會、跨文化傳播、媒介語言、英語新聞報導等。主要著作包括《新聞寫作與報導》(主譯)、《新聞聚焦》(主編)、《透視BBC與CNN媒介組織管理》(審譯)、《國際會議交流教程》(合著)及論文多篇。目前主持清華大學基礎研究基金專案《媒介語言的社會效果研究》、亞洲基金項目《中韓國家文化形象對比研究》等。

**高默波** (Mobo Gao)，英國愛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博士，現任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Tasmania)副教授(Reader)。著有*Gao 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等著作。近期研究項目包括“文化大革命”研究等。

**林松輝** (Lim Song Hwee)，英國劍橋大學博士，現任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東亞系講師、“世界電影”碩士課程負責人，學術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主編。英文專著*Celluloid Comrades: Representations of Male Homosex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s* (《影像同志：當代中文電影中的男同性戀再現》)於2006年出版，合編*Remapping World Cinema: Identit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Film* (《重繪世界電影：電影中的身份、文化與政治》)，主要研究方向為中港台電影及同性戀文化。

**劉康** (Liu Kang)，美國杜克大學教授、杜克大學中國傳媒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英文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美學與馬克思主義》、《全球化與中國當代文化變遷》等。中文著作有《對話的喧聲：巴赫金文化理論》、《全球化／民族化》以及和李希光等合著《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等。此外在美國、歐洲、日本英文學術刊物和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等地中文刊物上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多篇。現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全球化與中國傳媒、大眾文化等。

**毛思慧** (Mao Sihui)，英國蘭卡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碩士、香港大學比較文學（電影文化）博士。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文學院院長，現任澳門理工學院教授、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名譽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英國學、電影、比較文化研究、文化與翻譯。著有 *Technologising the Male Body: British Cinema 1957–1987* (1999), *Decoding Contemporary Britain* (2002)，主編《新視角：當代文學文化研究》(2000)，並在《電影藝術》、《中國比較文學》、《翻譯季刊》、《今日英國學》等雜誌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篇。

**彭麗君** (Laikwan Pang)，美國聖路易士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著作有 *Building a New Cinema in China: The Chinese Left-wing Cinema Movement, 1932–37* (2002)，*Cultural Control and Globalization in Asia: Copyright, Piracy, and Cinema* (2006)，以及 *The Distorting Mirror: Visual Modernity in China* (forthcoming)。

**沈旭暉** (Simon Shen)，牛津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耶魯大學政治系碩士、政治及歷史系榮譽學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西安交通大學亞歐研究所副所長。曾任香港科技大學訪問學者、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訪問研究員等。研究方向包括中美關係、民族主義、恐怖主義、中國及香港外交政策等。

**宋耕 (Song Geng)**，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比較文學專業），現任澳洲國立大學亞洲研究學院高級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翻譯、性別研究等。著有英文專著 *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2004)。中文編著有《重讀傳統：跨文化閱讀新視野》(2005)等。

**童慶生 (Tong Qingsheng)**，英國倫敦大學英皇學院博士，現任香港大學英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浪漫主義文學、英國人的中國觀念和現當代文學理論。

**王瑾 (Jing Wang)**，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外語系方肇周講座教授、比較媒介系兼任教授。授課內容與研究偏重於文化研究、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廣告文化與行銷、品牌建構、娛樂媒體與文化政策。她目前是外語系系主任，同時也是“MIT中國批判政策學”國際研究課題(<http://web.mit.edu/chinapolicy/www/>)的創始人與主持人。她目前正在撰寫新著 *Brand New China: Advertising, Media, and Commercial Culture*。

**王寧 (Wang Ning)**，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北京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並兼任國際文學理論學會秘書長、權威文學理論刊物 *New Literary History*（《新文學史》）和 *Critical Inquiry*（《批評探索》）中文版主編。主要著作有《比較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1992)、《深層心理學與文學批評》(1992)、《多元共生的時代》(1993)、《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闡釋》(1996)、《後現代主義之後》(1998)、《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1999)、《比較文學與當代文化批評》(2000)、《二十世紀西方文學比較研究》(2000)、《文學和精神分析學》(2002)、《超越後現代主義》(2002)、《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2003)等，並在國內外發表中英文論文三百餘篇。

**吳燕娜 (Yenna Wu)**，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現任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中文教授、亞洲語言文化部主任。研究範圍包括中國文學、文化、語言等。已出版八本書，發表四十多篇學術文章。英文著作包括：*The Chinese Virago: A Literary Theme* (1995), *The Lioness Roars: Shrew Stories from Late Imperial China* (1995),



*Ameliorative Satire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Xingshi yinyuan zhuan—Marriage as Retribution, Awakening the World* (1999)等。中文著作有《中國婦女與文學論集》第一集(1999)，第二集(2001)。與魏綸教授(Philip F. Williams)合著 *Chinese the Easy Way* (1999), *The Great Wall of Confinement: The Chinese Prison Camp Through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Reportage* (2004)；合編的 *Remolding and Resistance among Writers of the Chinese Prison Camp: Disciplined and Published* 即將由 Routledge 出版。另外，與賀謙、楊穎合著的教科書《我和中國》將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

**肖慧 (Xiao Hui)**，南開大學英語系碩士畢業，現為伊利諾宜大學東亞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晚清小說、現當代中國文學、電影和文化研究。曾在 *Orientalism, Concentric, Asian Cinema*，《天涯》和《中國社會導刊》等刊物上發表中英文論文。

**徐賁 (Xu Ben)**，美國麻州大學英文博士。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英文著作包括 *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 (1999)；中文著作有《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份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2005)以及《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即將出版)。

**葉雲山 (Ye Yunshan)**，1968年生於中國湖北。1994年湖北大學英文系畢業。1997年赴美留學，先後獲教育學、圖書館學、比較文學碩士學位。現撰寫文學博士論文。

**周小儀 (Zhou Xiaoyi)**，英國蘭開斯特大學博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國際比較文學協會(ICLA)理事。曾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研究員(1997–2000)、台灣佛光大學文學系客座教授(2004–2005)。主要研究領域為英國唯美主義、消費文化理論、20世紀西方文論、比較文學。著有《超越唯美主義：奧斯卡·王爾德與消費社會》(1996)、《唯美主義與消費文化》(2002)。